未來的根據到底是什麼？
汪暉會議發言（錄音整理）

從今天上午溫鐵軍教授的發言、薩米爾·阿明教授的發言、包括剛才大家的發言當中，我們看到一個圖景，是非常巨大的挑戰。但是我們都在尋找這個可能性，怎麼去改變？所以我選的題目是“未來的根據到底是什麼？”

我們一般討論未來的時候好像都是一個抽象的、烏托邦式的未來。討論未來常常總是壓抑的，但是它是在我們腳下的、在我們的行動裡的。我就想從這個話題開始做一個引言。不久以前，我遇到一位德國的學者，他問我一個問題：如果讓你做一個回答，什麼是中國的未來？用一個象徵性的、物質性的存在代表什麼是中國的未來？他原來是阿多諾的學生，所以我知道他背後的問題，有一點像XXXX（實在聽不清）（Erebus: 我記得好像是本傑明）所討論的巴黎，好像從十九世紀裡面伸展到二十世紀裡面來的，哪怕是在納粹佔領之下也必須和這個存在相一致，它代表著一種未來的考量、但是是從過去裡面來的。

我就想到了一個比喻，這個比喻中，我們今天的討論“可持續實踐與鄉村建設”中鄉村在中國的比喻——我在討論中國的未來的時候，想到二十世紀的兩個例子，一個是毛澤東的例子、一個是梁漱溟、盧作孚、晏陽初他們所代表的鄉村建設的這兩個例子，我把他們作為從二十世紀伸向未來的可能性的象徵。在1929-1930年，也就是中國的大革命失敗以後最困難的一段時間，也是中國革命開始進入新的階段的時期，毛澤東曾經發表過一些文章，文章的標題很有意思，一個是“星星之火能夠燎原”、一個是“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都是講革命的。在革命的討論當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毛澤東在尋找這些可能性的時候，他是怎麼尋找的呢？當時中國都是白色恐怖，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中心地區的武漢、上海這些地區很強，在中心地區找不到這個可能性。所以他說，在邊區、在落後省份交界的地方，存在著可能性，他把那裡叫做“薄弱環節”。在中國，我們這一代以上的人都知道這個“薄弱環節”，這個“薄弱環節”代表著未來。看起來是最落後、最沒有希望的地方，代表著未來的可能性。二十世紀的歷史是在最大的失敗和危機的情勢下，尋找到這個可能性、這個“薄弱環節”的時候，革命歷史發生了一次很重要的轉折。

這是一個例子，第二個例子就是我們今天討論的鄉村建設運動。這兩個例子是互相參照的。因為梁漱溟先生也好、盧作孚先生也好、還有晏陽初先生、還有中國革命所討論的鄉村問題，事實上都代表了二十世紀很多可能性的基礎。今天早上，溫鐵軍教授在討論到中國的某一種特殊性的時候，特別提到中國的土地、中國土地制度的形成，通過中國革命形成的相對平等的土地制度是和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不太一樣的。由於這個土地制度和一場廣闊的社會動員聯合在一起，儘管當中的問題非常非常的多、非常值得反思，但是這個土地制度的形成是通過自主的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運動當中產生出來的一個社會的自主性的體現。它在基礎上面是帶有社會制度性的自主性的。這和東亞有一些國家，比如日本，在戰後

由於美國的佔領、或者依附於當時的帝國主義體制所產生的土地再分配，是不一樣的。中國是在大規模的農村運動、農業社會中所產生出來的可能性。

因此，要討論中國社會在二十世紀曾經產生過的、今天我們現在還正在部分享受著的遺產，它已經面臨嚴重挑戰。我們可以稱之為自主性的危機。這個危機是跟土地的問題、鄉村的問題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也就是說，這個國家構造的自主性，如果依附性越來越高，比如買了大量的美國國債、我們的發展模式大規模的依賴國際市場、我們必須依靠農業但又沒有能力進行持續的保障，自主的能力就會越來越弱。這是和其他社會體制發生危機的關係聯繫在一起的，也就是說二十世紀的偉大傳統被丟失了。而這種丟失就導致了現在這個重要的危機。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今天確實需要討論的兩個中心問題，一個是阿明教授提出的，重新定義什麼叫“興起”的問題；第二個我覺得是溫鐵軍教授一開始也提到的“主權外部性”的問題，在中國的歷史中長期存在著獨立自主的傳統。但是隨著基本社會體制發生轉變之後，外部性的要素也滲透到自己的體系當中，這使得重新定義“興起”在中國今天的語境裡面變得尤其的急迫。我們在總結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遺產時，反思批評非常多，反思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們不能像“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拋掉”一樣否定二十世紀的歷史傳統。這個問題在今天的中國，是非常尖銳的問題。在我過去的文章裡也提到過，討論中國發展和改革的基本前提，至少有三個方面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一個政治前提是上午討論過的，在二十世紀形成的比較獨立自主的國家性格，以及和這個國家性格相應的相對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這是改革的前提。歷史遺產中的問題需要改革，但是改革的前提是在這個基礎之上的。第二，這個“獨立自主”不僅僅是我們一般說的“民族國家” Nation State，而是一個漫長的政治過程的產物。它不是一般民族國家主權意義上的“主權”，而是一個獨立自主的社會進展的產物，是一個社會運動的產物。其中，這個社會進步是特別重要的。在中國二十世紀的革命以來，最重要的社會進步，也就是中國二十世紀最大的獨特性，就是這場社會運動是通過農民和農村的大規模的社會動員和社會改造來完成的。我們都知道，在二十世紀的前期，中國工業在國民經濟體系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中國工人階級的人數非常少，中國絕大部分基本上是農業的農民的社會。所以，在這場鬥爭當中，無論是軍事的、還是經濟的、還是政治的社會轉變，主要是通過農村社會的社會轉變而來的。正是因為這樣的一場運動是在一個農業社會裡面發生的，同時它又帶有追求社會主義的性質（新民主主義裡面包含了社會主義的性質），因此，就其社會政治條件而言，要求超越自身社會階層的利益來追求公共的普遍性利益。對農村社會而言，當時的創造一方面是要分得土地，獲得農民自身的利益；同時，這個階級解放的過程是包含了創建新社會的過程，創建新社會的過程中還包含了一個自我否定，這是農民的農業社會裡面、當年的社會政治裡面的超越性。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是，這場社會動員是通過“鄉村和城市”、“革命政黨/知識份子和農民”的廣泛結合才能產生的。這個結合，我們用一個二十世紀的術語——“階級”這個概念。今天這個概念我們已經陌生了、不會去討論。當這些

知識份子、精英階層跑到農村去、跑到延安去、跑到鄒平跑到定縣、別的地方去。當他們這樣和農民一起工作的時候，不是一個簡單的“下鄉”的過程，而是轉化自己的主體性，把自己融入到社會裡面，不是讓自己等同于農民、而是共同去創造一個新的社會主體性。一個新的社會主體性在這個交融當中重新產生出來。這個過程，在二十世紀的政治術語裡面，我們也可以把它叫做“階級的背叛”，背叛自己的本階級而去和另外一個階級結合，不是簡單的變成那個階級、而是產生一個新的政治主體性。這樣的一個政治的社會條件，在今天大規模的小時。在今天的當代中國社會裡面，只是存在著一些痕跡、存在著一些人的努力。我們在今天看到的許多的志願者、合作社的實驗，從事鄉村建設、環境保護等等各種各樣的社會運動，一定程度上是這個歷史遺產在當代社會條件下的某種延續。

就大的角度來說，為什麼這個事情需要闡發、它的重要性在哪裡？在當代的條件下，不是簡單的可以回到二十世紀的政治遺產裡面去。我們講二十世紀，不等同於要恢復這個時代。我們需要瞭解這樣一個運動，這些實踐所需要的基本條件是什麼。今天我們一天的討論裡面，我自己已經學到很多，有關全球化、金融、糧食、土地、水……所有這些領域普遍存在危機的狀態。就政治方面來說，當代全球化、壟斷性的全球資本主義在任何一個社會中的政治層面所造成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呢？我曾經用一個術語來概括它，這個術語叫做“代表性的斷裂”或者“代表性的衰落”（The crack of representation），它背後所表示的就是政治的體制、政治的構造和一般的社會關係、社會形式之間產生著巨大的斷裂。這樣的體制並不是發生在單一的社會中，每一個社會中政治和社會形式之間的分離都不是一種社會形式之中產生的。我們看西方，在美國、在歐洲，以及在中國這種完全不同於西方的政治條件之下，也都出現政治形式和社會形式之間巨大的脫節。包括那些已經看到的壟斷性的、寡頭性的要素的浮現。在中國，曾經高度流動的社會中，現在的底層社會卻很難有管道流向另一個階層，這樣的社會流動性大規模的衰落。也就是說政治形式和社會形式的脫節是中國社會和許多社會在今天的許多危機的中心環節。

在這個環節裡面，我認為有幾個基本的層次、要素，我曾經用一個順口溜一樣的說法來說明這個危機的幾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我把它叫做政黨的國家化。“政黨”在二十世紀曾經是連接著社會和國家的一個政治性的運動，它代表的不單是價值，而且它通過這個運動使得不同的社會階層逐漸形成代表著自主性的社會，形成由下而上貫通社會流動的體系。但是今天我們的政黨，就其規模而言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期。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出現過這麼規模龐大的政治組織。但是，這樣的政治組織的政治性質卻在不斷的衰落，它逐漸的退化成為一種國家機制。一方面可以看到政黨好像是掌握著很多的權力，但是它運作的方式卻越來越遵循一般的國家的邏輯。這使得這個社會中政治的動力出現了問題，至少在中國是這個狀況。

第二個方面，由於國家的這個政治邏輯而發生了很重要的轉變——國家越來越接近於公司化的運行，我們把它叫做“政府的公司化”。我們經常在公共政

策，甚至很高層的政策諮詢中也經常看到，一個檔中經常出現自我矛盾的表述。為什麼會自我矛盾呢？因為它代表不同的利益，都需要在這個檔當中得到表達，甚至相互矛盾的意志都會在同一個檔中獲得表達。這意味著它盤根錯節的和今天的市場經濟裡面的社會關係糾纏在一起。

第三個方面，是所謂“媒體的政黨化”。今天媒體的力量越來越大，媒體經常表述出一些政治的意向、提出政治的議題，但是事實上媒體的這些政治議題不能夠代表一般社會的真正的運動。以鄉村建設做一個例子，這些實踐在我們的媒體中能夠呈現的只是非常非常少的一點點。絕大部分的話題都被另外一些力量所設置，當政治力量發生了危機、原來的政黨不能夠清晰的提出未來目標的時候，似乎是由媒體在不斷的設置新的議題。但是這些媒體同樣被各種利益所操縱，所以它不斷地流動，極大的鼓勵了政治上的投機和虛無。這是今天很清楚的一個現象。

第四個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今天由於金融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勞動分工在這個條件下發生的變化，我們在中國社會出現了很重要的一個悖論式的現象——一方面中國開始了最大規模的工業化，今天中國的工人已經將近三億，絕大部分這些工人都是從農村來的，我們稱之為“農民工”的這些新工人。這是一個大規模的階級製造過程。我們知道雖然存在著很多的問題，但是在這樣的大規模的階級重構的過程當中，原有的二十世紀意義上的階級政治同時在大規模的衰落。並不是不存在，而是轉化了，不能再向過去一樣發生動態的運動。當然，可以在理論上去思考什麼是階級、怎樣去理解階級政治這些問題。但是就我們最膚淺的觀察，我們以工人的鬥爭來看、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之間的關係來看。可以舉出三種不同形式的鬥爭模式。其中的兩種模式是大家常常討論到的。一種，在媒體中談的比較多的，是法律維權。就是說依據《勞動合同法》等這些法律來保護工人的這些權益。它基本上建立在今天的法律的基礎上，它的重心在於維護工人個人的權益。這是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努力，有很多的 NGO、律師在做這樣的事情。但這種運動大部分情況下主要集中在工資收入、勞保待遇的談判和保障方面。第二種更具有政治性一些，是圍繞著公會的運動。比如像 HONDA（本田）汽車的罷工，慢慢產生出相對獨立的公會。在一些跨國企業當中，也逐漸產生出這樣的工人運動。這些運動的產生，事實上與原有的社會主義體制的轉變有密切的關係。原因很簡單，在過去的社會主義體制裡面由於有公有制，所以公會的角色和西方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裡面的公會角色完全不一樣。所以在歐洲的社會運動、包括當年的社會主義運動當中，工會運動是遠遠早於一般的社會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的。但是在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裡面，恰恰是共產主義運動或者說社會主義運動帶動著公會的運動。後來的政治性的運動並不是從一般的工會運動當中發展出來的。所以社會主義體制確定之後，工會所扮演的角色是一個說服、教育、幫助、一定程度的保護的角色。所以，他和公有制條件下的國家是連體的。當市場化的社會轉型之後，原有的體制就不再能代表工人、也不能保護工人了。所以，工人的政治運動在這個意義上需要有一個政治的發展，需要更加自主的

組織的發展。但是，所有這些運動我們雖然不斷可以看到，但我們也看到它們的能量有限，在今天它不是一個能在宏觀上改變整個方向的運動。第三種鬥爭的形式常常是被忽略的，但是影響是巨大的，它在報紙新聞中經常不是作為運動、鬥爭來表述的。它是這樣的，比如說當經濟危機到來的時候，很多工廠、大型的跨國企業都紛紛從沿海到了內地——這些勞動力更加密集、也比沿海更加廉價的地區，這也是未來一段時間裡面所謂維繫中國經濟增長的條件。但是最近出現的現象非常有意思，就是即便是在這些所謂勞動力剩餘的地區、人口密集的地區，也出現了勞工短缺的現象。我們過去說沿海碰到過這樣的問題，而現在在內地也常常會出現勞工短缺的現象。還有一個現象就是所謂“打工短期化”的現象，就是說很多工人不願意在工廠呆很長時間，他們待一年兩年甚至半年就離開了，所以造成了工廠在雇傭方面的困難。我們前一段時間看到河南富士康招收工人的時候，當地政府需要每招一個工人補貼兩百元，說明招工是個很重要的壓力。這個壓力是從哪來的？我覺得，這是個很重要的要思考的一個問題，而且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種鬥爭的形式。

因為這就討論到我們今天討論的可持續的實踐和鄉村建設的重要性。當代城市社會當中，勞動者地位的變遷必須和鄉村建設的問題連接起來才有可能改善城市勞動者的位置。這是逼迫資本作出妥協。這是最基本的一個條件。第二個我們值得注意的具體的鬥爭形勢裡面，我覺得非常有意思，我自己去過一些地方，也觀察過一些地方，我覺得很有趣，一個很重要的現象是，所謂“打工短期化”發生的時候，很多農民幹了一兩年就離開了工廠到別的地方，或者去尋找別的工作或者回到自己家鄉的某一個地方去尋找工作，他們在這樣做的過程當中是有損失的，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用《勞動合同法》來保護他們工作的權益，因為他們提前離開所以沒辦法簽署資方要求的幹五年的勞動合同，他們提前離開了就得不到真正的勞動補償。在這個得不到勞動補償的狀態下，尤其是在一些邊遠地區、包括尤其是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他們出現的狀況是什麼呢？比如有些地區的勞工的組織是利用原來鄉村裡面社區的聯繫，在城市當中進行鬥爭。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有正面有負面，比如說出現了領工制的現象，也就是出現了一些中間人，這些人都是家鄉的，每年帶著一些工人到城裡來和公司簽約，工人離開的時候就由這些中間人代表工人去和資方談判，能夠討回一點點的利益。這個過程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一點，一方面這個過程當中有雙重剝削的問題，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們要保存的是什麼？是值得注意的。我們都知道富士康工廠裡面自殺的事件，今天的生產使得人完全的異化疏離，使得他們完全沒有辦法形成社會關係。領工制這樣的社會網路，實際上是在城市化的條件下他們重建自己社會關係的一種努力，就是說，他們試圖把原來在鄉村當中帶來的社會聯繫變成自己在城市的生活中重建社會關係和社會網路的過程。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是我看到的一個新的連接點。使得城市工人的社會運動和社會鬥爭和鄉村社會的建設和鬥爭重新關聯起來的一個運動。這也使得我們重新理解二十世紀的另外一個政治遺產，就是城市和鄉村關係的重構。工人和農

民之間的新的聯繫，在這個條件下，我們可以重新思考我們的未來。
謝謝！